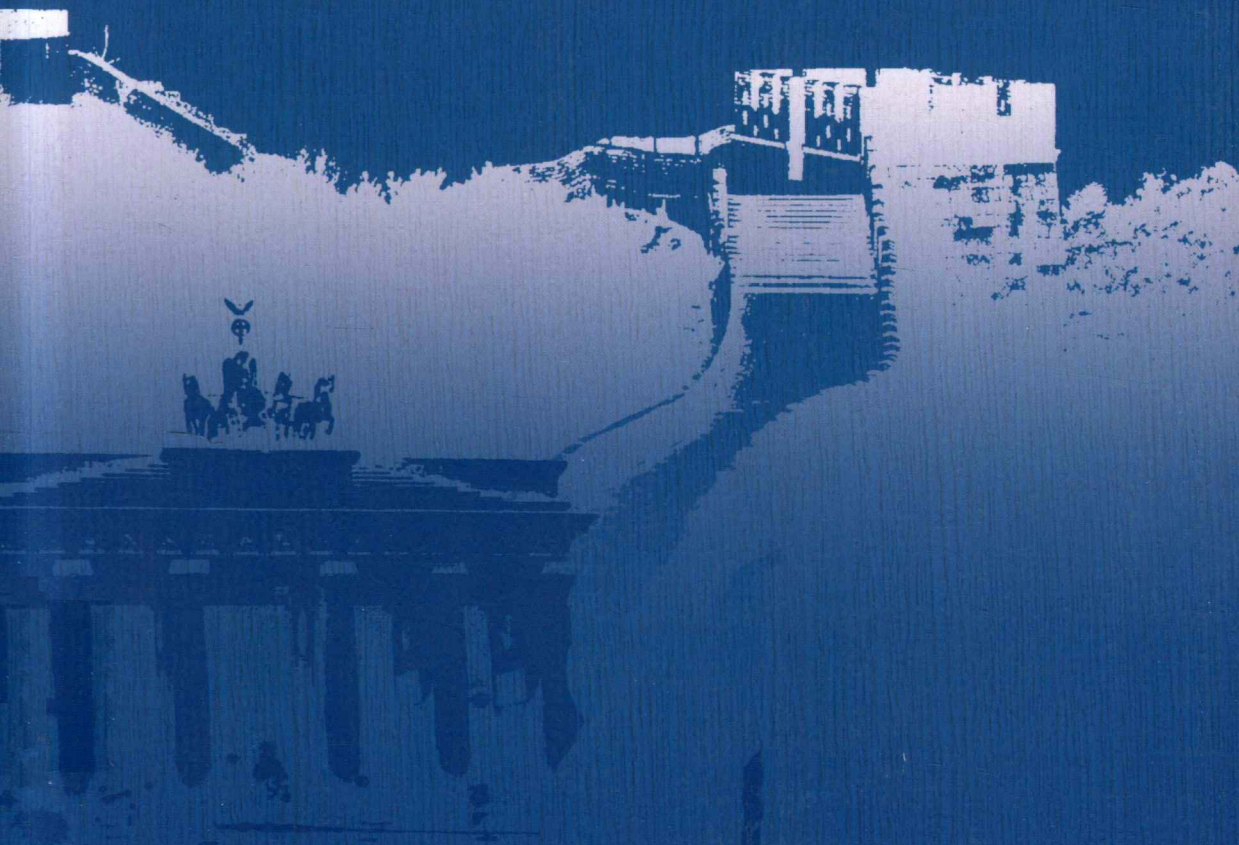


中德建交40周年 回顾与展望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40 YEARS' CHINA-GERMANY DIPLOMATIC RELATIONS

顾俊礼 主 编
杨解朴 副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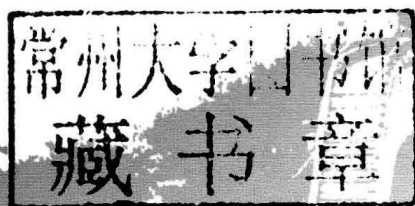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德建交40周年 回顾与展望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40 YEARS' CHINA-GERMANY DIPLOMATIC RELATIONS

顾俊礼 主 编
杨解朴 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德建交 40 周年回顾与展望/顾俊礼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097 - 3946 - 4

I. ①中… II. ①顾… III. ①中德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史料 - 1972 ~ 2012 IV. ①D829. 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0717 号

中德建交 40 周年回顾与展望

主 编 / 顾俊礼

副 主 编 / 杨解朴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王晓卿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杜若佳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8.5

版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字 数 / 460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946 - 4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顾俊礼 1939年生，江苏泰兴市人。曾留学慕尼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国



社会科学院欧洲所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执行委员、国际教学部主任、欧洲系主任，《德国研究》杂志副主编，德国研究会会长，欧美同学会德奥分会副会长等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著作有：《联邦德国公务员制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联邦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德国政府与政治》（台湾版）、《西欧政治》（主编、合著）、《福利国家论析》（主编、合著）、《欧洲政党执政经验研究》（主编、合著）、《西方政治制度比较》（合著）、《德国》（列国志）等。

杨解朴 欧洲政治专业，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副秘书



长、德国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福利国家制度、欧盟社会政策、德国政治制度等。主要研究成果有：《从文化共同体到后古典民族国家——德国民族国家演进浅析》（论文）、《德国民间组织：发展状况与社会功能》（研究报告）、《德国社会保障制度报告》（研究报告）、《德国福利国家的自我校正》（论文）、《欧盟治理下社会伙伴的角色变化》（论文）等。

序

相互包容，共建未来

——祝贺中德建交 40 周年

周 弘*

中国与德国之间的关系，如果算上文化和思想方面的交往，可谓源远流长了。但是中德国家间关系的稳定发展，中德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的全面而深入的合作却是在 40 年前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后逐步展开的。此前，中国和德国之间虽然交往不断，但是终究没有形成全面、稳定和深入的中德关系局面。

自 1972 年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以来，中国和德国都各自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继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又通过改革开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力量；德国也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获益，更是经历了令世人瞩目的两德统一历程，成为欧洲乃至世界上具有多重影响力的强国。中国和德国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相互借重、彼此促进，使中德关系不断深入，不仅国家间关系基本保持了稳定，经贸关系全面展开，而且通过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促进，中德人民之间的交往也日益频繁，相互学习日益增多。

中国和德国有很多相似和互补之处，因此发展多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例如中国和德国都注重发展实业，都是贸易出超国，都有自强不息的传统，但又往往都是“做得多说得少”，而且疏于自我表达和彼此沟通。中德关系

*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学部副主任，中国欧洲学会会长。

发展较好的时期大都是务实合作开展顺利的时期，但是每逢中德关系受到意识形态或错误认识的左右，中德之间的务实合作就会受到不良影响，给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带来伤害。

对国家间关系的片面分析和错误理解是一种十分常见但值得忧虑的现象。全球化的多重纽带已经将国家与国家、企业与企业、社会与社会、人民与人民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几乎每日每时都有新的跨国协议在达成，新的对话平台在建立，新的交流渠道在打通，新的合作成果在产生……但是观察者们会因为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局限，而无法全面深入地认识并解释这气象万千的国际关系。当观察者们囿于各自的认知水平而作出相互抵触但又各自片面的分析、判断和表述时，国家间的务实合作也会或多或少受到伤害。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中德关系中。

这部集子的编者和作者借助中德关系 40 周年的纪念为读者奉献了一幅中德关系的全景图。这里既包括了前任中国驻德国大使的回忆，也收录了专家们对中德在政治、经贸、财经、科技、环保、能源、教育、文化、军事安全以及法治等各领域关系发展的见证，还邀请了中国德国学界知名学者撰写了他们的分析文章和真知灼见，通过将各个片段汇集一册的方式，全面展现了 40 年来中德关系的方方面面，也为我们全面了解并理解中德关系的发展提供了真实可信的事实和分析。

这种方法还体现了中国人善于从全局观察问题的传统和善于从事务的发展变化出发包容差异的习惯。正是这种全局观和发展观曾经成就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多彩，使中国将大量包括德国要素在内的外国要素融入了自身进步的过程，这种全局和发展的眼光也会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德关系。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中德关系的真正动力和真实情况，并且进一步证明，意识形态的差异并不能阻挡中德关系发展的历史潮流。通过这部集子中的回顾与分析，更多的人将会了解全面而非片面的中德关系、深层而非浅表的中德关系、变化而非静止的中德关系，相信这种努力将有助于推动中德关系的未来发展，并通过中德在各领域的合作，造福中德两国人民，贡献于世界的和平与进步。

目 录

前 言	顾俊礼 / 001
-----------	-----------

第一篇 大使篇

亲历中德建立

——从驻外记者到大使	王 殊 / 019
中德关系回顾、剖析和展望	梅兆荣 / 042
回顾与思考	
——纪念中德建交 40 周年	卢秋田 / 055
新世纪中德关系的全面发展	马灿荣 / 066

第二篇 学者篇

德国在欧债问题上的立场	裘元伦 / 087
市场经济的经验与意蕴	冯兴元 / 098
德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原因与展望	丁 纯 李君扬 / 118
中德经贸关系的回顾、现状与前景	史世伟 / 138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与发展	潘琪昌 / 163
“德国的欧洲”与“欧洲的德国”问题新考	连玉如 / 174
德国“争常”的过程、障碍与前景	郑春荣 / 193
德国思想理念对当今世界的贡献	刘立群 / 208

德国高等教育改革及其启发	孟虹 / 216
--------------------	----------

第三篇 调研篇

建交 40 年来的中德政治关系	赵柯 芦睿珺 / 235
中德经贸合作 40 年成就与展望	朱伟革 / 247
中德财经交流与合作回顾与展望	张国春 / 267
中德科技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芦睿珺 / 273
中德环保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杨解朴 程玕 / 286
中德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利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李彦 / 299
中德建交 40 年来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孙莹炜 / 311
交流中的变迁	
——中德 40 年来的教育合作	席茹 / 324
中德建交 40 年以来的军事、安全关系	唐寅初 / 331
中德法治合作与对话	史惠宁 / 341

第四篇 文献篇

一 部分重要的联合声明和新闻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两国建立 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 355
中德关于温家宝总理访德的联合声明	
——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	/ 356
中德关于共同努力稳定世界经济形势的联合声明	/ 359
中德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	/ 36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轮中德政府磋商	
联合新闻公报（全文）	/ 366
中德关于建立电动汽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全文）	/ 371
第二轮中德政府磋商联合声明（全文）	/ 373

二 部分重要的协定与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 合作协定	379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 双重征税的协定	381
中德经济合作协定	396
中德法律交流与合作协议	4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社会保险协定	40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互相承认 高等教育等值的协定	407
中德投资保护协定	410
中德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416

附 录

中国驻德大使名录（1972 ~ 2012）	421
德国驻华大使名录（1972 ~ 2012）	424
中德友好省州、友好城市统计（截至 2012 年 7 月）	427
中德关系大事记	时 雨 / 430
后 记	446

前言

顾俊礼

201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交40周年。中德建交^①40年来，两国各种合作机制从无到有，双边贸易从小到大，人文交流从少到多，两国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②处于中国与德国交往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

新中国成立之初曾主动对联邦德国示好。新中国和联邦德国几乎同时成立，但新中国从成立时起就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并且公开宣布对外实行向苏联“一边倒”^③的外交政策。联邦德国本来就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的，当时还不是一个享有完全主权的国家，而且正如阿登纳所说：“无论过去和现在我都确信，只有执行一种和西方紧密而坚定的结盟政策，才能有一天使德国在和平与自由中重新获得统一。”^④所以，在以

① 二战后，德国被分裂成两个德意志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1949年10月27日建交。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国与民主德国的外交关系即告终结。从此，中国与统一德国的外交关系也就由中国与联邦德国外交关系这一脉传承和发展。

② 胡锦涛会见默克尔，<http://www.xinhuanet.com>，2012.02.3。

③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7，第1410页。

④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中译本，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第88页。

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美苏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两国从成立起就似乎决定了要长期处于对立状态。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苏联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欧、对德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也随之调整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德政策。1955 年 4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颁布《关于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命令》^①。然而，中国早在 1949 年 10 月 27 日与民主德国就已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实际上已不存在结束“战争状态”的问题。很明显，毛泽东的这一命令主要是针对联邦德国发出的。1956 年 1 月 30 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更加正式、直接地提出：“为了和平和重新统一德国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中国也欢迎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② 同年 6 月中旬，周恩来在接受德国记者采访时再次表示：“我们的立场是，如果（中国和联邦德国）建立起这种正常的政治关系，将会有利于和平的事业。”^③ 可联邦德国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的上述善意一概不作正面回应，而于 1955 年 9 月 21 日以密件电告联邦德国驻香港总领事，称：“联邦政府不打算考虑中国对联邦共和国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所做的试探。”^④ 这样中国主动对联邦德国的示好，最后以失败告终。

联邦德国坚持不与台湾当局建立官方关系，为后来的中德接触以及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内战中失败的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后一直想跟联邦德国拉关系。1949 年 10 月 28 日，台湾当局的“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致电德国汉学学会主席施特夫，转达他对联邦德国总统豪斯和联邦总理阿登纳的诚挚祝贺，并希望台湾与联邦德国尽快建立外交关系^⑤，未被德方理睬。1951 年，台湾当局同联邦德国驻巴黎总领事直接接触，提议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遭到冷遇。同年 8 月 28 日，美国人直接出面提议联邦德国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也遭到德方拒绝。1954 年阿登纳访问希

① 《人民日报》1955 年 4 月 9 日第一版。

② 《新华半月刊》1956 年第 5 期，第 13 页。

③ 《新华半月刊》1956 年第 5 期，第 15 页。

④ [德] 恩斯特·马约尼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斯图加特·科尔哈默出版社，1971，第 36 页。

⑤ [德]《德中通讯手册》，汉堡，1996，第 176 页。

腊时，台湾当局所谓“大使”当面向阿登纳提议台湾与联邦德国建交^①，也未得逞。联邦德国长期坚持不与台湾当局建立官方关系，是以阿登纳为代表的德国政治家们对发展中德关系的一大贡献，也是中德关系中的一大亮点。

美国对联邦德国的强大压力是导致中德首次官方正式谈判失败的主因。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苏关系缓和，中苏关系的恶化日趋明朗化和尖锐化，中法建交；另外，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联邦德国经济界渴望打开中国市场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联邦德国官方的首次正式谈判在瑞士的伯尔尼举行，而且于1964年5月25日起先后举行了四轮谈判。联邦德国原计划通过谈判与中国签订一项政府级贸易协定，并在海牙向美、英、法三国通报了此事。可是在谈判中，联邦德国方面抛出了“柏林条款”问题，企图利用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获取它在同东欧国家谈判时得不到的东西，达到既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又在“柏林问题”上捞到政治实惠的目的。中国在“柏林问题”上坚持原则，联邦德国又不敢作出足够的让步；更恶劣的是，联邦德国总理艾哈德访美时于6月13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德将同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保持一致，不打算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和缔结贸易条约、给予中国商业贷款或采取其他什么主动。这表明联邦德国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仍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尽管1965年2月11日联邦德国驻英大使馆一秘向我驻英代办处表示，德方愿同中方负责商务的官员洽谈两国贸易问题，并就双方感兴趣的政治问题交换意见，但中方未予置理。1965年9月，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中国拒绝同联邦德国建立官方的贸易关系，也不会与它建立任何其他官方关系。至此，中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第一次官方接触无果而终。

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推动了中国与联邦德国之间政治上的接近。60年代末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东西方缓和浪潮席卷欧洲。以勃兰特为首的联邦德国政府在国际大气候的推动下加快了推行其“新东方政策”的步伐。随着美苏矛盾的发展，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出现了新的转机。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了恢复，美

^① 潘琪昌主编《百年中德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第160页。

国总统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签署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使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也大大促进了西方其他国家同中国发展关系的进程。

在上述大背景和大形势的推动下，中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也发生重大变化。联邦德国政府从中、苏、美大三角关系出发，想利用我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一方面牵制苏联，另一方面逐步摆脱美国的控制，以增加它在欧洲小三角的回旋余地，并试图利用我国广阔的市场。中国则认为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苏联采取的是麻痹西方的“声东击西”战略。苏联陈兵中苏边界，对中国的威胁大于美国，中国愿意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以结成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反对“苏修”的统一战线；同时增加同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经贸往来。双方互有需要，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条件已经成熟。

1972 年 7 月中旬，基民盟副主席、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格哈德·施罗德访华是中国与联邦德国关系的重大转折。当时，中国在联邦德国的唯一正式机构是新华社驻波恩分社，是两国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1970 年 1 月，德外交部主管中国事务的官员霍夫曼首先向新华社驻波恩分社首席记者王殊^①表示：德外交部愿派人去北京或邀请中国外交部派人来波恩就双方有兴趣的问题举行谈判。此后各种信息便循这一渠道频繁交换。1972 年 2 月 21 日施罗德约见王殊，正式提出访华请求，并于 1972 年 7 月 14 日至 28 日访华。访华期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同施罗德就两国建交的实质性问题交换了意见，于 7 月 20 日签署了谈判建交问题的备忘录。施罗德访华实际上是中国与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前奏。

中国同联邦德国之间的建交谈判非常顺利。1972 年 8 月 18 日首轮会谈^②在波恩外交部内举行，先后举行了八轮会谈，9 月 29 日两国代表王殊和史塔登在波恩草签了两国建交公报。由于联邦德国一直没有同台湾当局建立外交关系，所以，整个建交谈判都未涉及台湾问题，建交公报当然也就不会涉及这个问题。

① 王殊：江苏省常熟人，1924 年 10 月生，曾先后担任中国驻联邦德国公使、大使、《红旗》杂志总编、外交部副部长、驻奥地利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等职。

② 中方参加人员是：全权代表王殊，工作人员梅兆荣、王延义、邢桂敏；德方参加人员：政治司长史塔登、法律司长贝伦顿、德国问题司长布来希和一名译员。

联邦德国外交部长谢尔访华，签署了中德建交公报，实现了中德关系的历史性突破。谢尔访华是我国当时对外斗争中继日本首相访华和中、日建交后一个带有全局性的外交行动，对利用美、苏等各方矛盾，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苏修”，壮大自己，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毛泽东、周恩来对此都十分重视。1972年10月11日，联邦德国外交部长谢尔率领由39名成员、29名记者随行的庞大代表团访问中国。根据事先的商定，谢尔抵京的当日，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同联邦德国外交部长谢尔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①周恩来在会见谢尔时表示：中国支持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国，并强调我国不赞成一个国家被人为地一分为二的立场。两国建交揭开了双边关系的新篇章。10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随着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一定会获得进一步的增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定将得到不断发展。”联邦德国政府新闻局发表公报称，同中国建交是联邦德国新东方政策的“里程碑”，是联邦德国“走进世界政治的标志”。^②

二

中德建交后，双边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往发展很快；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政府代表团互访频繁，构成了两国政治关系迅速发展的重要标志。但总体来看，两国关系也不是很平顺，它大致经历了起伏相伴的三个发展历程。

1. 1972年10月~1989年5月的良好发展时期

两国建交后，两国贸易迅速发展。建交时双边贸易额只有2.74亿美元，1981年便迅速增长到22.20亿美元。其他很多领域的合作也都快速展开。1975年10月，双方进行了关于建立经济混合委员会的换文，签订了“海运协定”、“民用航空运输协定”，后来又陆续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国在汉堡和联邦德国在上海设立总领馆的协议”、“文化合作协定”、“卫

^① 建交谈判时，中方曾就建交公报文本提出过90多个字和50多个字的两个文本。建交谈判第一轮会谈时双方就建交公报文本达成了现在的这个正式签署的公报文本。

^② [德] 德国联邦政府新闻局：《公报》，第144号，1972年10月17日。

生合作协定”、“铁路合作协定”、“农业技术合作议定书”等。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 1975 年 10 月访问了中国，并作为西方国家第一位政府首脑到访新疆乌鲁木齐。中国政府总理华国锋于 1979 年 10 月也访问了联邦德国。其他人员交流也很频繁。

但是，以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为首的联邦德国政府一方面热衷于推行“新东方政策”，另一方面又慑于苏联的压力，中德对苏联态度产生严重分歧，以致有时甚至严重影响双边关系的发展。所以，建交后的第一个十年，双边关系虽有良好发展，却平淡无奇。

1982 年 10 月联邦德国政府发生更迭，组成了以科尔为首的联合政府。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科尔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开始调整，联邦德国赞赏我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及我国国内改革、开放的方针，愿意在政治上同我国寻求更多共同点，经济上同我国扩大和加强合作，技术上对我国的保留也比美、日少。在这期间，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和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先后访问联邦德国，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两次访华，并在 1987 年 7 月第二次访华时作为西方国家第一位领导人参观访问了西藏。截至 1988 年底，双方还签订了“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财政合作协定”、“关于建立两国外交部间磋商制度议定书”等九项协议。双边贸易额跃增到 49.18 亿美元，其他各领域的合作全面发展。两国关系进入了最活跃的高潮期。

2. 1989 年 6 月 ~ 1998 年 9 月曲折中的全面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中德关系具有两大特点。首先，在 1989 年 6 月至 1996 年 6 月的七年期间，两国之间发生了两次重大摩擦，双边关系遭到了严重挫折。第一次是围绕 1989 年 6 月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德国对华“制裁”展开的。德国联邦议院于 1989 年 6 月 15 日通过决议对中国进行强硬“制裁”，从各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在西方国家当时“制裁”中国的逆流中，德国虽不算带头者，却是唯一以国家议会的形式“制裁”中国的欧洲国家，因此，“制裁”在短期内难以改变，而且影响十分恶劣，以致双边关系一落千丈，仅在商贸、文化、科技等少数领域得以勉强维持。

两德统一为中德关系的恢复提供了新的转机。在 1990 年 10 月德国统一的当天，中国政府副总理在会见德国驻华大使时表示：“中国政府 and 中国人民一贯理解、同情和支持德意志人民要求实现统一的愿望。我们尊重德国人民的选择，欢迎德国最终实现和平统一。”“中国过去同两个德意志国家

都有着良好的关系，今后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统一的德国加强和发展中德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①另外，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动荡不定相比，不仅保持着国内稳定，而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外，经济全球化愈来愈深化，统一德国的地位也在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认识到必须恢复同中国的政治关系，于是在1992年12月10日联邦议院通过决议正式取消了1989年对中国实行的“制裁”，正式宣布实现中德关系正常化。从此，两国政治关系重又开始密切，其他领域的合作尤其是经贸合作得到迅速发展。1993年1月，德国政府决定不批准向台湾出售潜艇，这是德为发展对华关系而作出的重大政治决策。同年9月，德国政府提出新的“亚洲政策纲要”，强调中国在亚洲地区和世界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表示要同我国建立长期、稳定、全面的合作关系。新亚洲政策纲要的出台进一步推动了中德关系的全面发展。

第二次摩擦是围绕德国在西藏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做法展开的。1996年6月，德国政府默许与参与执政的自民党接近的瑙曼基金会在波恩举行西藏问题国际会议，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引起了中国的不满。会议结束后，联邦议院还通过了题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议案中公然称达赖及其仆从为“流亡政府”，还要求中国政府与之谈判。联邦外交部长金克尔竟然对此决议表示“完全支持”，并扬言决议内容包含了德国政府对西藏政策的“基本点”。中国政府对此发表严正声明，谴责德国一些人公然践踏国际法准则和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的恶劣行为，并采取外交行动，取消了包括德外交部长在内的人员互访计划，中止了瑙曼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在华的一切活动。中德关系降到了1989年以来的最低点。

第二个特点是，双边关系尽管在这期间出现重大波折，但由于双方的需要，各个领域的合作还是得到全面的发展，高层互访频繁。1993年11月，科尔作为统一德国总理访问中国。1994年1月乔石委员长访德。同年7月李鹏总理访德。1995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德进行国事访问。1995年11月科尔第四次访华。1996年11月德国总统赫尔佐克作为统一德国的国家元首访问中国。1997年6月中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访问德国。其他

^① 《人民日报》1990年10月4日。

人员交流也大幅增加。1997 年 10 月两国外长在中国《人民日报》和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上联名发表文章，祝贺中德建交 25 周年。这期间，双边贸易额从 1989 年的 49.88 亿美元增加到 1998 年的 143.5 亿美元。1994 年 9 月双方签订了“环境合作协定”，1995 年 7 月两国签订了《关于中国在慕尼黑和德国在广州增设总领事馆的协定》。同时，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也全面加强。

3. 1998 年 10 月以来的全面快速发展时期

冷战结束后，世界出现了一个超级大国、多个强国并存的新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统一后经过几年内部整合，羽毛丰满，名义上开始推行外交政策“正常化”^①，实际为“崛起战略”；另外，中德双方各自在对方崛起战略中也寻找到一些利益交汇点。于是，双方开始架构两国之间的战略协作。

施罗德政府执政期间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德关系最明显的特点是双方奠定起信任基础，双边关系定位开始提升。施罗德作为联邦总理首次访问中国是在 1999 年 5 月 8 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后的第四天进行的。访问中，施罗德总理代表德国和北约对中国使馆被炸事件向中国领导人表示“无条件道歉”，并公开表示北约必须毫无保留地、彻底地调查这件事的真相，并公布于众。同年 11 月 2 日施罗德总理第二次访问中国。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毫无保留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会参与任何对中国构成潜在危险的行为，他提议中国加入八国集团，希望中国尽快加入世贸组织。施罗德访华中的积极姿态体现了德国对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优先性。

两国高层的频繁互访，把双边关系推向了新的高潮。2000 年 6 月，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德国。第二年 10 月，施罗德总理第三次访华。2002 年 4 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第二次访问德国。同年 12 月，施罗德总理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并出席上海磁悬浮列车通车典礼。2003 年 9 月，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同年 12 月，施罗德总理第五次访华。2004 年 5 月，中国总理温家宝首次访德，并与施罗德总理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存在着广泛的一致。双方同意在中国与欧

^① 《1997-1998 欧洲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 108 页。